

《虔台倭纂》的形成： 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①}

刘 晓 东

摘 要：《虔台倭纂》是基于对嘉靖“倭患”的深刻记忆，面对万历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现实危机，编纂而成的一部以“防倭御倭”为主要目的的私人著述。通过对该书编撰群体及成书过程的分析，不难发现早在“壬辰之役”之前，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关于“日本”与“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这部分来源于嘉靖年间曾任职于“倭患”猖獗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江西籍官员，对“倭寇”相关问题的介绍与传播。江西籍官员对东南沿海地区平倭御寇斗争的参与，极大强化了两个地域间的内在精神联系，也成为其塑造、强化自身地方荣誉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本为“倭患”地区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日渐成为某些“非倭患”地区予以认可、接受的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倭寇 《虔台倭纂》 江西 历史记忆

明代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尤其是嘉靖年间的“倭患”，极大促动了中国士人关注日本热潮的形成。自嘉靖以来，或是出于防倭御倭、或是出于猎奇远夷的目的，时人针对日本的相关著述明显增多。这些著作不仅保留了众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现了明代社会“倭寇”与“日本”认知的流播及其形成路径。事实上，16世纪前后的“倭寇”骚扰，虽主要集中于东南部的浙、直、闽、粤等沿海地区。但这种地方性的社会经验，却在经过一系列的信息流布与整合后，日渐扩展成为一种颇具全国性的共有记忆，成书于万历年间的《虔台倭纂》，就是其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本文拟以《虔台倭纂》的形成为中心，通过对该书编纂群体，及其成书过程的梳理，进一步解析作为受“倭患”影响相对较小的江西等内陆地区，“倭寇”与“日本”认知形成的大致谱系，及其由一种“地方经验”向“共有记忆”转换的社会路径。^①

①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六世纪前后的倭寇与东亚区域秩序研究”（10BSS009）阶段性成果。

① 对于“倭寇”问题的研究，早从20世纪初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至今仍是东亚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且取得了不菲成果。其中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日本的山根幸夫、三田村泰助、田中健夫、村井章介，韩国的李铉淙、韩文钟、李领，中国台湾的郑樑生、王仪，以及中国大陆的陈懋恒、李光璧、林仁川、戴裔瑄、汪向荣、范中义等。不过，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倭寇”这一历史事件本身，诸如“倭寇”的社会构成、产生原因、侵扰路线及状况等方面的考察，而将“倭寇”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进一步探讨其对东亚区域社会秩序演变的影响，还是学界少有涉猎的一个领域。就目力所及，近年来的

—

《虔台倭纂》是以谢杰为代表的一部分晚明知识人，基于对嘉靖“倭患”的深刻记忆，面对万历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现实危机，编纂而成的一部以“防倭御倭”为主要目的的著作，最早刊行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三月，此时正值明王朝援朝御倭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明、日之间议和封贡时期。

这样一部书的问世，在当时私修史书颇盛的历史环境中，并不十分显眼，似乎也未引起过多的关注。因此，不仅《四库全书》未见收录，谢国桢先生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中也只字未提，更未见近人有专门性的研究。的确，若仅从该书内容来看，多剿袭前人旧作，似乎新意不足。^① 但有趣的是，“虔”乃是江西赣州的一种古称，与嘉靖、万历时期的“倭寇”并无直接性的关联，之所以以“虔台”命名，是因为该书的主要编撰者谢杰，曾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南赣”，^② 该书正编撰于这一期间，并自题“虔填抚闽长乐谢杰汉甫氏著录”。^③

南赣巡抚全称为“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初设于弘治十年（1497），^④ 目的是为了防剿赣南内陆山区的“流贼攻劫”。^⑤ 据（万历）《明会典》记载，南赣巡抚“辖江西岭北赣州道及广东岭东惠潮道，岭南韶南道、福建漳南道、湖广上湖南郴桂道，俱听节制”。但其真正直接下辖的只有“赣州兵备一员，驻扎会昌县，整饬赣州地方兵备，兼分巡岭北道”，其余各道均隶属于该省巡抚之下。^⑥ 事实上，隆庆之后南赣巡抚的辖区，名义上虽包括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之部分地区，但其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管理区域，还是江西地区。^⑦ 台湾学者唐立宗先生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代表南赣巡抚逐渐退出征剿海盗、倭寇的战场，而专治理窝藏在深山峒岭的盗贼土寇”。^⑧ 可见，万历皇帝任命谢杰为南赣巡抚，显然是希望通过提典兵务，抚绥江右、安辑边地。但他却废精竭神，主持修撰了一本与“倭寇”相关的书籍，颇有“不务

① 相关研究主要有李恭忠、李霞的《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台湾学者吴大昕的《倭寇形象与嘉靖大倭寇：谈〈倭寇图卷〉、〈明人抗倭图〉与〈太平抗倭图〉》（《明代研究》（台北）第16期，2011年）；刘晓东的《南明士人“日本乞师”叙事中的“倭寇”记忆》（《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等。

② 吴玉年先生在《明代倭寇史籍志目》一文中，著录了《虔台倭纂》一书，认为该书“均‘人云亦云’之论，无独特之处”（参见王庸编：《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附录”，第178页）。若从该书内容来看，着实多剿袭旧作，除《隋书·东夷列传》、郑晓《吾学编》、王世贞《倭志》等书外，大部分内容皆直接辑录自《筹海图编》一书。不过，在编撰过程中，谢杰等人还是多少根据自身意志，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修改与增删，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在“壬辰之役”影响下，晚明士人关于日本认知的某些潜在转化，亦不乏其历史价值所在。对此问题，容另文专述。

③ 《明史》卷227《谢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67页。

④ 参见谢杰：《虔台倭纂》卷首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⑤ 《明史》卷73《职官二》，第1778页。

⑥ 《明宪宗实录》卷275，成化二十二年二月甲申，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640页。

⑦ 《明会典》卷128《兵部·镇戍·督抚兵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63页。

⑧ 参见傅林祥：《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⑨ 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

正业”之嫌。其中原因，固然不乏日本入侵朝鲜事件的刺激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谢杰本人相对特殊的生活经历，及其对“日本”与“倭寇”问题的长久关注。

谢杰，字汉甫，福建长乐县江田人，万历二年（甲戌）进士，除官行人，册封琉球。后历任光禄寺丞、两京太常少卿、顺天府尹，又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南赣，累迁为南京刑部右侍郎、北京刑部左侍郎、户部尚书。万历三十二年去世，万历皇帝封赠其为太子少保，“遣官护丧，赐祭葬，祀于乡”。^①

福建长乐县，“东抵海灣，西抵闽县界，南抵福清县界，北抵海”，^② 颇富渔盐之利，海上贸易十分发达。从明朝初年开始，这里就是琉球贡船与中国封船出入的要津。同时，也是明代“倭患”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林绳武《海滨大事记》记载，自嘉靖十九年（1540），海贼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分掠福建、浙江”以来，长乐县就频遭倭寇侵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嘉靖二十九年，海寇入长乐；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倭贼经长乐石尤岭，一路骚扰至福宁；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倭贼水陆沓至”，八月“寇长乐，沿途焚劫”；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寇至长乐坑田登岸，抵福清，搜剔无遗，又淫雨滃雾，兵火逾三月，骸骨相望”；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倭贼迭犯福清、长乐、闽清、兴化，“焚杀掳掠，极其惨酷”；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倭犯长乐；嘉靖四十年四月，“倭寇长乐南北乡，杀掠无算”；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又寇长乐，往福清，陷宁德；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倭寇长乐，四月，总兵戚继光“分别诸将趋福州，合击倭之支党于长乐，破之，倭悉遁去”。^③ 可以说，自嘉靖三十五年以来，长乐几乎无年无“倭寇”之扰。尤其是嘉靖三十七和四十一年两次侵扰，更直接深入到了谢杰的故里——江田。^④ 这种桑梓之祸，对时已二十余岁的谢杰来说，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恐怕也是引发他关注“日本”与“倭寇”问题的潜在诱因。

万历四年，任职于行人司的谢杰被选为副使，与正使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一起，出使琉球。谢杰的当选，显然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尤其对“海洋”、“海民”社会的深刻了解是密不可分的。后来萧崇业在记述出使过程时，就曾谈到出发前谢杰的诸多条陈谋划之功：

费已不貲而丝忽又公帑出，余心内弗自安，时时与谢君商之，舟从汰其什一、军器损其什五、交际俭其什七。先是，诸具物率治之以官，今令平贾，而精黠奸户，故求多于有司，诸具物往往以丑恶相欺售。谢君为闽中人，素晓畅其事，乃一一理条其大小，诏余不然者，辄奉三尺随其后。于是舟之庀也，大都多谢君指画焉。^⑤

这次出使历经四年方才完成。回国后，两人一起编纂了《使琉球录》一书。若从该书所载内容来看，除却“倭寇”骚扰对出洋日期的影响外，几乎没有更多关于“倭寇”或“日本”的内容。表面看来，这次出使似乎与日本并无什么关联性可言，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大约20年后，谢杰又作了《〈琉球录〉撮要补遗》（又称《使事补遗》）一书，以补所缺，

① 孟昭涵、李驹等：民国《长乐县志》卷23《列传三·名臣》，《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59页。

② 郝玉麟、谢道承等：雍正《福建通志》卷5《疆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7册，第323页。

③ 林绳武：《海滨大事记·福州倭患始末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台北：大通书局，1988年，第123册，第2—6页。

④ 孟昭涵、李驹等：民国《长乐县志》卷3《大事记》，《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1册，第33页。

⑤ 萧崇业：《使琉球录》卷上《使事纪》，《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3辑，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第55册，第77页。

“《琉球录》为使琉球作也，业已备矣。然就中有文而烦者、有阙而略者，余为撮其要而补其遗，盖期于简要，工拙非所论云”。^① 关于这部“补遗”的主要内容，清人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有所记叙：

使之有《录》，自明陈侃始；侃直曰《使录》，郭汝霖、萧崇业皆曰《使录》，俱止一篇。谢杰《使事补遗》始分八款，曰原委、使礼、册封、用人、启行、敬神、国俗、御倭；外集有《日东交市记》，又《琐言》二条，曰事权、曰恤役。^②

可见，这部“补遗”除却本集外，还包括外集的《日东交市记》和《琐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发生在出使期间，明朝使团与日本“倭商”冲突事件的回忆与记述。本集中的“御倭”一条就是对这次事件原委的记录：

夷与倭为邻，而民贫国小，有所不足，辄假贷于倭。每遇封使远临，在他国或至、或不至，倭无不至者，名称往贺，实则索逋于其国也。所居舍馆，去天使馆不二里而近，夷虑我众之不善于倭，又虑倭众之不利于我，每为危言以相恐，欲迁我众于营中。科使问余，余曰：“此非故事；但须严禁诸役勿擅与通，自可无虞。若无故而亟迁，是避倭也，岂有堂堂中国而避外夷乎！”科使如余言，不迁。久之，飓风大作，我众与倭各卫其舟，致有争竞。倭伤首役一人，血流淋漓，众遂大怖，扶归哀愬，状颇仓皇。余验其伤，乃刀背、非刀口，喜曰：“此急而自救，非乱而相戕也。宜收众役入馆，徐敕彼之馆伴往谕，倭众必不为祸。”科使然之。少顷，王亦遣彼众二千余人驰来护舟，舟各获完，倭亦随息。盖其时之天幸如此。先是，辛酉之使，前导驱倭不退，以鞭鞭之。倭怒，操利刃削其鞭立断，然亦未尝伤人。己卯继往，戒诸役曰：“我使仪卫入城，倭夹道而来者，乐观其盛耳。势不必驱，亦不待驱！”皂辈咸唯唯。比往还，竟无他衅。盖倭号倭奴，其曰奴者，有主之者也；时无主者，故不为乱。后之遇此，当思所以驭之，严于自治而勿与校可也。^③

除此之外，谢杰还另作《日东交市记》一文，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补充。由此可见谢杰对这次事件的重视程度。

谢杰为何在20年后才将此事件揭示出来，其中之原委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与“倭人”的遭遇与冲突，给谢杰的日本认知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倭人的桀骜不敬，以“堂堂中国”竟被请求以避“倭夷”的尴尬，恐怕也是其多年关注日本并主持创作《虔台倭纂》的动力所在。

二

《虔台倭纂》一书虽多云为谢杰所作，但实则由多人通力合作而成，谢杰在为该书所做的“序”中就明确说到：

（前缺）匪韬铃所宜，乃为纂于虔台。纂者，略之也。议始于陈子信，辑于柳子邦奇、傅子良桥、朱子琦、张子仕斌，而傅与张尤力焉。余则为广之，广之尤损五之二，则纂与

① 夏子阳：《使琉球录》卷下《群书质异·附旧使录》，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琐言附）》，《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3辑，第55册，第269页。

② 周煌：《琉球国志略·凡例》，《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245册，第1页。

③ 夏子阳：《使琉球录》卷下《群书质异·附旧使录》，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琐言附）·御倭》，《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3辑，第55册，第279—280页。

略之谊也，是非缪于與人者。^①

据此我们不难得知，该书的最早倡议者为陈信，后由柳邦奇、傅良桥、朱琦、张仕斌四人共同辑录，其中尤以傅良桥、张仕斌用力最多，最后由谢杰增广而成。关于几位同修者的身份，书中只云为谢杰“麾下”，并未留下较为翔实的资料，因而对这一创作群体的状况，可以说几乎一无所知。不过，通过对一些地方与域外资料的细致检寻，对其中某些人物的状况，我们还是多少寻找出了一些相关信息。

1. 傅良桥

傅良桥是《虔台倭纂》编纂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除却谢杰所说的他与张仕斌用力最多外，书中还引述了几段他关于防倭、御倭的见解与观点。这是其他几位同修者所未有的，由斯也不难想见其在该书编撰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傅良桥的相关信息，诸如《明实录》、《明史》等重要史籍中皆未见载，但在同治《金溪县志》中我们找到了一篇较为翔实的传记：

傅良桥，字汝济，昂第四子，举万历七年武乡试，明年成进士，授福建北路守备，擢广东练兵游击，二十五年奉调从总兵刘綎征倭。抵朝鲜时分道进师，贼将行长据顺天，八月进攻失利，监军参政王士琦怒，綎惧，督良桥力战，连败之，行长遂弃顺天遁归。班师叙功，良桥擢神枢营执事，晋阶昭勇将军，图像御屏，寻擢广东东山参将，在官勤训练，明赏罚……以故士乐为用。三十三年，思明土官叛，总督戴耀檄良桥进剿，连战破之，擒其头目，抚定余众而还。会被劾，功不录，遂以疾请告归。^②

另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明朝政府在送达朝鲜国王关于派遣援兵的咨文中，曾提到“未到游击傅良桥，领南赣兵一千五百，到时派”。^③同年九月九日，朝鲜国王巡视了傅良桥的兵馆，可见此时他已率兵进入朝鲜境内，该条记载后面，还明确标明了其籍贯属地，“（傅）良桥，江西人也”。^④十二月，他还和当时身居援朝御倭前线的麻贵、邓子龙、第归器等一起，受到了给事中徐观涛所谓“侮帅无状”的弹劾。^⑤当时朝鲜官僚申钦在所作《象村稿》中也记载，“傅良桥，号越所，江西抚州金谿县人，武进士，以钦差统领南赣汀韶兵游击将军都指挥僉事，领步兵二千，戊戌九月出来，己亥三月回去”。^⑥

由此我们大概可知，傅良桥应该是出身于江西金谿县的一位将官。谢杰巡抚南赣时，曾效力于其麾下，并参与了《虔台倭纂》的纂修工作。“壬辰之役”中的万历二十六年九月，被派往

① 谢杰：《虔台倭纂·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册，第227页。

② 程芳、郑浴修等：同治《金溪县志》卷23下《人物志五·武功》，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70册，第545—546页。

③ 奇自献、李恒福等：《宣祖实录》三之卷98，万历二十六年宣祖三十一年（戊戌）三月二十九日，甲寅，《朝鲜王朝实录》，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57年，第23册，第407页。

④ 奇自献、李恒福等：《宣祖实录》三之卷104，万历二十六年宣祖三十一年（戊戌）九月九日，辛卯，《朝鲜王朝实录》，第23册，第492页。

⑤ 奇自献、李恒福等：《宣祖实录》三之卷107，万历二十六年宣祖三十一年（戊戌）十二月十四日，乙丑，《朝鲜王朝实录》，第23册，第544页。

⑥ 申钦：《象村稿》卷39《志·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8页。

朝鲜，率领南赣军士参加了援朝抗倭战争，次年三月班师回国，^①因军功先后提升为神枢营执事、广东东山参将。后来，还参与了平定思明州土官叛乱的工作。

2. 柳邦奇

清雍正年间所修的《江西通志》中，对柳邦奇确有所记载，但十分简略，只云“柳邦奇，巴陵人，由武进士”仕至“都指挥僉事”。^②由此我们可知他并非江西本地人，而是相距不远的湖南巴陵（今岳阳）人，曾考中过武进士。光绪《巴陵县志·选举志》中也确有其名，但却“榜年无考”。^③从光绪《巴陵县志》的其他相关记载来看，正德年间“以忤逆刘瑾”而声名鹊起的山东参政柳尚义，也属于“岳州府巴陵县军籍”出身，^④两者可能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

至于柳邦奇何时到江西任职，着实不甚明了。从现有资料来看，他似乎也未像傅良桥那样，后来被派往朝鲜，参加援朝抗倭战争。不过，他却参加了万历时期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军事行动——平定播州之乱。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十一月，湖广抚按在关于“征播”的题本中，曾提到“原任都司吴时乔，游击柳邦奇、王一桂等，据称谋勇素裕，堪置行间，应如议起用，功成之日，分别叙擢”。^⑤可见，柳邦奇因“谋勇素裕”，与吴时乔、王一桂被荐举启用，参加了平定播州的军事行动。当时主持平播之役的“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四川”的兵部右侍郎李化龙，在给万历皇帝的上疏中，也对柳邦奇的情况略有涉及，其云：

原任蓟镇南兵游击柳邦奇，学书学剑，乃武乃文，气陵貔虎千群，胸藏甲兵数万……

乞敕兵部再加查议，如果其材可用，合无将吴时乔、柳邦奇、王一桂，各以原官，责令提兵振旅，分布沅州偏镇等处，俱听总兵陈璘督部进战，矣平播功成，分别叙用。^⑥

由此我们大概可知，柳邦奇兼具文武之才，以武进士出身，任职江西，曾效力于谢杰麾下，并参加了《虔台倭纂》的编修工作。后来，调任蓟镇南兵游击，不知何故黜职。万历二十七年被荐起复，参加平定播州之役，后又调回江西，升任都指挥僉事。

3. 陈信

作为该书最早倡议者的陈信，也出身于江西地区，据同治年间所修的《江西东乡县志》记载：

陈信，字仰高，麻溪人，巨首环目，促颈虬髯……以勇力闻。弱冠从戎，随总帅邓子龙征关白。一日营垒未定，参戎傅良桥出哨，遇白骁将于道，穷追不已，傅濒危，信望见跃马，刀取追者首，护桥还，前后歼馘百计，功授百夫长。寻调征播，播故在万山中，信登高入险，常以身先。播平，大将军刘綎荐之，晋千户，世袭饶州所，未几复征缅甸，每驾象战，马遇之则蹶。信乃以利刃前截象鼻，象却走，践毙缅甸人无数，师得以成功，迁康

① 另据赵庆南在《乱中杂录》所载，其归国时间在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初四，“春正月元日，徐给事丁主事王按察留全州宴享，陈御使留陕川海印寺。……初四日，徐给事等自全州向京，曹希彬、傅良桥等自南原领军向京，并还天朝（《乱中杂录》第八，“己亥”，首尔：首尔大学藏奎章阁图书朝鲜王朝宣祖年间刻本）。

②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47《秩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4册，第551页。

③ 姚时德、郑桂星等：光绪《巴陵县志》三之卷22《选举志一·表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册，第55页。

④ 姚时德、郑桂星等：光绪《巴陵县志》三之卷28《人物志一·列传》，《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册，第95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341，万历二十七年十一月己巳，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332页。

⑥ 李化龙：《平播全书》一之卷2《增楚省监军将才粮饷开款疏》，《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982册，第70页。

山守备。蠡湖故多盗，闻信勇力皆敛迹，晋游击，守后禁门，门所出入皆珰贵，信猛质不为礼，珰恶之，遂称疾归。^①

由此可知，陈信似乎武猛过人，与邓子龙、傅良桥一起，被派往朝鲜参加了援朝御倭战争。据朝鲜相关史料记载，在“钦差统领建昌都司营兵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司懋官的票下，确有一位陈信，他领步兵三百余人于万历二十六年六月进入朝鲜抗倭，次年三月回国。^②两者是否为同一人，由于资料所限，尚难确定，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从朝鲜归国后，陈信又参与了平定播州之役，以及征讨缅甸的战事，以军功升授康山守备。后调入京城，晋游击，守卫禁门，因得罪内官太监称病归养。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他确实是在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从江西守备的位置调至京师，担任神枢四营游击。^③

至于朱琦与张仕斌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更为翔实的其他相关资料，只能留以待考。也正因如此，就一般状况来说，他们的职位可能较上述三人明显低些，且出身于江西本地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从谢杰之生平与诸位纂修者的经历来看，应该不存在着早已结识的可能。因此，《虔台倭纂》一书的编撰，当是在谢杰出任南赣巡抚，与诸位同修者相识之后，才逐渐展开的。关于谢杰巡抚南赣的具体时间，他的相关传记中均无详细记载，着实难以断定。不过，通过对《实录》中相关记载的分析，还是多少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年七月辛未，谢杰由光禄寺卿升任顺天府尹。^④但到万历二十三年正月癸巳，谢杰已以“巡抚南赣汀韶等处”的名义向万历皇帝上疏，并云“臣叨镇虔已逾期矣”，^⑤可见此时他担任南赣巡抚应该已有一段时间了。同年六月癸卯，谢杰又由“巡抚南赣右副都御史”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对谢杰出任南赣巡抚的具体时间，仍然难以确定，但大致而言应该是在万历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三年正月之间，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及至万历二十三年六月，谢杰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离开了赣州。而《虔台倭纂》最早刊行于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即谢杰离开赣州的前三月。也就是说，从万历二十年七月到二十三年三月，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实际时间应该还要少得多），谢杰等人就完成了《虔台倭纂》的编纂工作。

这里颇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内陆省份的江西，与日本的直接关联性并不是很大，据地方志书记载，在元代初叶，为征伐日本，确曾于“至元十六年……春二月，勅赣州造战船”，^⑦引发民间骚动，为此时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的贾居贞特上疏劝止，未果而终。^⑧但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几无类似之情形。即便是嘉靖年间，东南部沿海地区“倭患”的猖獗，虽曾促动了一些地

① 李士棻、王维新等：同治《江西东乡县志》卷13之七《人物志七·武功》，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上》，第71册，第212—213页。

② 据申钦：《象村稿》卷39《志·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中云：“司懋官号建菴，四川夔州卫人，以钦差统领建昌都司营兵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领步兵三千一百。票下陈信，领步兵三百三十，戊戌六月出来，己亥三月回去。”（《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9册，第298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393，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丁酉，第7413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250，万历二十年七月辛未，第4656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281，万历二十三年正月癸巳，第5196页。

⑥ 《明神宗实录》卷286，万历二十三年六月癸卯，第5297页。

⑦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31《武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4册，第89页。

⑧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57《名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5册，第23页。

方官员筑城防倭之举，如巡抚都御史何迁主持修固瑞州南城、陈抑亭主修九江城等，^①但“倭寇”终未进入江西腹地，因而对当地军民生活的影响也并不是很大。那么，何以在万历年间谢杰巡抚南赣之时，却与当地将士就“靖倭”问题迅速形成互动，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虔台倭纂》一书的编撰呢？这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日本入侵朝鲜之现实危机的影响与促动。通过对前面《虔台倭纂》形成过程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谢杰巡抚南赣之前，江西地区就应该已形成了一定的关于“倭寇”与“日本”的地方认知，这也成为两者能够迅速形成互动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在《虔台倭纂》梓印之前，江西举人罗曰褫就已编成《咸宾录》一书，而嘉靖年间曾任浙江巡按御史的江西新建人谢廷杰，还编纂完成了十卷本的《两浙海防类考》。^②

三

“壬辰之役”之前，江西地区对“倭寇”与“日本”认知的地方知识储备，与嘉靖时期江西客兵参与平定东南部沿海地区倭乱的经历与体验，恐怕是不无关联的。据清初徐鉉为戚继光所作的传记中记载：

以御史胡宗宪总督浙直戎务，敕东南帑藏，悉从调取；天下兵勇，便宜征用。于是，南调湖广土兵、广东瑶兵、广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赖兵、崇明沙兵、邵林僧兵；北调山东枪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氏、北边骑兵、北平射手，凡称胜兵者，辄致之。^③

徐氏所云诸客兵中，并无江西客兵的名目，黎光明在其所作《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一书中，也几未提及江西客兵的存在。^④不过，据俞大猷亲身经历所见：

东南各省地方，原有可调之兵：如山东有长竿手，河南有毛葫芦，浙江有金处台，福建有漳泉，广东有新会东莞，江西有安远、龙南，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各有土官兵。每遇巨盗生发，就近征调三两万众，随檄而集。且各省地方，原有可用之器，如长竿手惯用长竿诸器；毛葫芦惯用短枪诸器；金处台惯用狼筅竹枪诸器；漳泉惯用藤牌标枪诸器；新会东莞惯用长牌砍刀诸器；安远、龙南惯用大旗长枪诸器；土官兵惯用钩刀镖牌药弩木矛诸器。一遇调募，各挟惯用之器而来。^⑤

可见，其中是有着江西客兵的身影的。事实上，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倭寇迫南京时，就曾“募南赣兵千人，两广水兵五百，听南京兵部尚书张璠调度，守南京”。^⑥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因倭寇大举侵扰福建、广东，兵部奏请“调浙江新募义乌兵一枝，以戚继光统之；江西兵一枝，令抚臣自择良将，各星驰应援……上悉命如拟行”。^⑦出身于江西丰城的抗倭名将邓子龙，可能就

① 吴山：《重修瑞州南城记》、余文献：《修九江城记》，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131《艺文记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7册，第655—656、669—671页。

② 参见曾国藩、刘坤一、刘铎等：《江西通志》卷103《艺文略·史部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8册，第514、517页。

③ 郭柏苍等：光绪《乌石山志》卷4《祠庙·戚俞两公祠》，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119页。

④ 参见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燕京学报》专号之四，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

⑤ 郑若曾撰、邓钟重辑：《筹海重编》卷9《经略一·客兵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27册，第176页。

⑥ 《明世宗实录》卷435，嘉靖三十五年五月甲戌，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7495页。

⑦ 《明世宗实录》卷517，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壬寅，第8487页。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募至东南沿海参与抗倭斗争的，广东《新会县志》就曾记载嘉靖四十二年八月，“给谏陈吾德复以江西邓子龙至。子龙善刀马，娴战阵，群盗畏之。或固守巢穴，或遁之罗旁，以避其锋。时倭寇厓门，当道檄指挥陶璨同子龙御贼，倭遁去。既而倭逼新宁，子龙驰赴新宁，击走之”。^①

诸如邓子龙这样的江西“客兵”，其亲身平倭的经历，无疑成为江西地区“日本”与“倭寇”认知的一个最为直接的知识来源。不过，从徐钊所云及黎光明先生的研究来看，他们的数量可能不会太多，才多少被忽视了。同时，相较江西而言，广西、河南等内陆地区的客兵规模，无疑要盛大得多。但在这些内陆地区，似乎并未如江西那样形成较深厚的关于“日本”与“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这点从《四库全书》所收十六部各省通志中，“倭”与“日本”两词的出现频次略窥一斑（详见表1）：

表1 《四库全书》各省通志中“倭”、“日本”两词出现频次统计

地方通志	倭	日本	总计	地方通志	倭	日本	总计
（雍正）畿辅通志	10	3	13	（雍正）江西通志	87	6	93
（雍正）浙江通志	122	20	142	（雍正）福建通志	44	4	48
（雍正）湖广通志	54	5	59	（雍正）河南通志	15	0	15
（雍正）山东通志	43	0	43	（雍正）山西通志	49	18	67
（雍正）陕西通志	17	0	17	（乾隆）甘肃通志	2	1	3
（雍正）广东通志	136	7	143	（雍正）广西通志	43	3	46
（雍正）云南通志	7	1	8	（雍正）贵州通志	7	1	8
（乾隆）江南通志	313	13	326	（乾隆）四川通志	0	0	0

从表1不难看出，雍正《江西通志》以93次排在了第四位，紧随其后的雍正《山西通志》仅有67次，其他省份更勿论了。^②可见，“客兵”规模的大小，和关于“日本”、“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之间，似乎并未形成有效的正比关系。因此，除却“客兵”因素外，江西地区关于“日本”与“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似当有更为重要的来源途径。

首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某些出身于浙江、福建等地的官员、文士，因为至江西任职或流寓，而带来了更多的相关讯息？诸如江苏丹徒出身的江西新建县教谕殷士望，便有着“嘉靖间倭寇缚其父大经，将刃之，士望诣贼请以身代，贼为感动，两释之”^③的特殊经历；还有白云先生陈昂，家本福建莆田，“隆万间，避倭难，携妻子客南昌，旋爱匡庐，旅于九江琵琶亭侧，以织草履为业，得钱辄沽酒间，或为人卜，凡匡庐幽险处，莫不登览”。^④不过，就江西地方志书中

① 林星章、黄培芳、曾钊等：同治《新会县志》卷13《事略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33页。

② 就常理而言，雍正《福建通志》中“倭”与“日本”的出现频次，较江西等内陆地区应该要相对较高些，但事实却与之相反。按照时人浙江巡抚朱纨所言“今日通番接济之奸豪，在温州尚少，在漳泉为多”（朱纨：《阅视海防事》，福建巡抚许孚远也说“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许孚远：《疏通海禁疏》，尤其是地方士绅如林希元等也多有参与其中者（参见林丽月：《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海上走私贸易》，《“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0年第8期，第91—111页）。因而福建地区对于“海禁”与“倭寇”问题的认识，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是有所差别的，这可能也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③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59《名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5册，第96页。

④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96《寓贤·广信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6册，第222页。

所提供的资料来看，类似的例子并不多。相反，余文献在《庐山纪事序》中倒记述了扬州籍官员桑乔，在谪居九江时因“不讲备倭”事，而与当地士林“喁喁讲备倭”风尚的鲜明反差。^① 因此，这似乎也不应是江西地方认知日本的重要讯息来源。那么，另外一个最为重要的途径，可能便是曾任职于“倭患”猖獗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江西籍官员，对“倭寇”相关问题的介绍与传播。

明代的江西地区文教鼎兴，人才辈出。尤其嘉、万年间，更有不少江西籍士人至浙江、南直隶、福建、广东等“倭患”严重地区任职为官，甚至亲身参与了当地的抗倭、防倭斗争。其中著名者如丰城人李遂，“以右金都御史提督操江，倭扰江北，廷议请特设巡抚，遂以故官抚凤阳四府。时淮阳四府倭寇，岁复大水，遂请饷增兵，恤民节用，次第画战守计”；^② 进贤人熊汝达，“除刑部主事，历泉州知府。岁己未，倭逼泉州，悉力捍御，与士卒为伍，夜分披甲不释，相持月余，寇去，泉人德之，为立生祠”；^③ 还有嘉靖年间的抗倭名臣谭纶，初“除礼部主事，迁职方郎中，台州知府。纶沈毅知兵，时东南倭患已四年，参将戚继光募乡兵御贼，数有功。纶亦练千人自卫，倭犯栅浦，继光以道阻失援，纶自将击之，三战三捷……寻改官福建，擢右金都御史，代游震得巡抚……”^④ 笔者仅根据清代光绪朝所修《江西通志》人物列传中的相关记载，大致统计就有 48 人之多（详见表 2）。

表 2 嘉靖时期任职浙直闽粤地区江西籍官员御倭事迹

姓 名	籍 贯	任职情况	卷 次	册	页 码
李 遂	丰城	以右金都御史提督操江，倭扰江北……以故官巡抚凤阳四府……时淮扬三中倭……次第画战守计。	卷 137《列传四·南昌府四》	659	471
熊汝达	进贤	泉州知府……倭逼泉州，悉力捍卫。	同上	659	473
吴 金	丰城	知建宁，潮汀贼蜂起，练乡兵固守。	同上	659	473
熊汝器	南昌	授上虞令，升苏州府同知……补松江同知，御倭有功，赐金帛，条陈备倭十事，略见施行。	同上	659	474
李 迁	新建	总督两广，以广东诸军破倭，斩酋千计。	同上	659	474
张 梈	进贤	授刑部主事，以事谪云川县丞，稍迁宁国同知。……入留都，适倭寇张甚……俄命总督闽广军务。	同上	659	475—476
万 敏	南昌	知太仓州……会上命汤克宽剿诸海寇……敏殿之……捕斩无算。	同上	659	476
熊廷用	丰城	为长乐观典史，时倭寇猖獗，逼县城，廷用登守御。	同上	659	477
吴桂芳	新建	历扬州知府，御倭有功，迁俸一级。……改……兵部右侍郎，提督两广军务。	同上	659	477
万思谦	南昌	知嘉定县，会倭患棘，乃城嘉定以备。	同上	659	478
李 材	丰城	由兵部郎中迁广东佥事……倭五千攻陷电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	同上	659	479

①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 138《艺文序三》，余文献：《庐山纪事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18 册，第 87 页。

②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 69《人物四·南昌府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15 册，第 392 页。

③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 69《人物四·南昌府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15 册，第 395 页。

④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 82《人物十七·抚州府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15 册，第 793 页。

续表 2

姓 名	籍 贯	任职情况	卷 次	册	页 码
刘 显	南昌	用兵部尚书张璠荐, 署都指挥僉事, 金书浙江都司, 迁参将, 分守苏淞, 倭犯江北……显防浦口……会福建倭患棘, 显与参将戚继光连破贼。	同上	659	479
喻南岳	新建	授六安知州, 适倭寇起海上, 改调通州, 历兵部员外郎中, 迁庐州知府。	同上	659	481
刘 建	丰城	任汀州、青州二府推官……闽倭乱后, 承檄巡行泉州。	同上	659	482
唐尧臣	不详	升杭州府同知, 擢浙江按察僉事, 备兵台严……倭至, 尧臣以戚继光兵连破之。	同上	659	482
聂 珙	上高	授刑部主事, 历官福建僉事, 会倭寇兴泉, 躬冒矢石, 民赖以安。	卷 141 《列传八·瑞州府》	659	565
李 偕	上高	官至广东兵备道, 平寇有功。	同上	659	567
王 京	上高	授同安知县, 谄练经略, 海倭不敢南犯。	同上	659	568
敖 璠	新喻	升兵备副使, 整饬苏淞, 会有海寇, 躬率义兵亟捕之。	卷 144 《列传十一·临江府二》	659	625
饶思聪	新淦	历官福建布政使……少负将略, 喜谭兵事……历仕藩牧十余年, 三歼巨寇。	同上	659	625
熊 逵	清江	历官广东廉使……迁浙江布政使, 浙方多事, 帑藏空虚, 乃剔贪冒清逋负, 筹画有方。	同上	659	626
刘正亨	新淦	署浦江教谕, 转兴宁知县……迁温州同知, 御倭有功。	同上	659	626
萧承命	清江	任广东东莞县典史……惠寇流劫村落, 会攻城, 承命督兵据敌。	同上	659	627
邓以和	新喻	为海南知州, 洗剔巨奸, 特建水陆二营, 倭不敢入寇, ……升宁国府同知。	同上	659	627
杨 标	清江	迁御史, 巡按广东, 会海寇平……	同上	659	628
李 楷	中族	授汤溪知县, 母艰, 服阙, 补青田。时倭躏东南, 楷积谷资守御。	卷 148 《列传十五·吉安府四》	659	709
王学夔	安福	历升湖广、江南巡抚, 所至俱有平寇功。	同上	659	710
周 延	吉水	迁广东左布政使, 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 靖海寇林成, 进兵部右侍郎。	卷 149 《列传十六·吉安府五》	659	715
宋仪望	永丰	授吴县知县……擢霸州兵备僉事……进大名兵备副使, 改福建, 与总兵官戚继光合兵破倭。	同上	659	717
彭 黠	安福	转兵部侍郎应天巡抚, 会倭寇迫太仓……复制机宜为驱剿计。	同上	659	718
朱 哀	泰和	举扬州同知, 倭寇犯境, 哀领兵出遇寇于沙河, 败之。	同上	659	718
周贤宣	万安	忤中贵出为延平守, 擢海道副使, 会倭寇逼城……帅师败贼众于漳浦, 升右布政。	同上	659	718
刘 恂	万安	授工部主事, 晋郎中……出守嘉兴。倭寇薄郡境, 恂峙饷缮兵……	同上	659	720
曾于拱	泰和	擢副都御史, 总督粮储。……其在闽藩也, 当倭讧, 诸道兵云集, 于拱蒿目焦思, 百计取盈, 士各宿饱。	同上	659	721
谭 纶	宜黄	台州知府, 沈毅知兵, 时东南倭患已四年……练千人立束伍法, 未久即成精锐, 倭犯栅浦, 自将击之, 三战三捷……寻改官福建, 擢右僉都御史, 代游震得巡抚任……	卷 153 《列传二十·抚州府三》	659	790

续表 2

姓 名	籍 贯	任职情况	卷 次	册	页 码
聂廷璧	金溪	升福建兵备副使，有平倭功。	同上	659	792
吴 衍	南城	由进士通判常州，时海倭猖沸，判主兵饷，馈给不乏，累迁刑部郎。	卷 155《列传二十二·建昌府一》	660	35
夏 浚	玉山	授海盐令……转温处兵备，时浙东海寇猖獗，浚授方略……相继奏捷。	卷 158《列传二十五·广信府二》	660	86
徐九经	贵溪	授政和县丞，壬戌倭寇围城，与知县周尚友坚守，援绝城陷，同死。	同上	660	86
徐 易	永丰	授鄞县令……时闲募兵教水战……亡何而海寇作，人服其前识。	同上	660	87
裴 化	贵溪	华亭县漆木镇巡检，倭入寇，化率兵御，死之，华亭人像祀焉。	同上	660	87
郑邦福	上饶	补福建僉事，迁粤东兵备，时海寇方讧……	同上	660	87
周 荣	乐平	奉诏督江南三省军器。	卷 163《列传二十九·饶州府三》	660	159
周 礼	乐平	擢福建参政，至闽，倭寇窃发，奉命专巡海道。	同上	660	159
舒春芳	鄱阳	授南刑部主事……擢福建僉事，备兵建宁，连御海倭山寇，底靖一方。	同上	660	160
汪 柏	浮梁	出为广东海道副使，海上有巨寇何姓者……捕擒之。	同上	660	161
陶一贯	星子	由选贡除福建布政司理问，退休因寓白下。闻倭贼潜入苏淞……自赴军门，请兵讨之……	卷 164《列传三十一·南康府》	660	190
万 衣	德化	初授南刑部主事……迁福建布政使，时倭犯兴化，来告急……趋莆田设奇兵待之。	卷 165《列传三十二·九江府一》	660	209

资料来源：曾国藩、刘坤一、刘铎等：光绪《江西通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省志”所载，多为地位声名较高者，遗失缺漏不在少数。诸如冒充藩臬大臣出为人质，终使朝廷“诡得”倭寇巨魁汪直的浙江岑江巡检涂志，就是江西新城人；^① 而曾追随戚继光“从征闽广”，被万历皇帝“呼为福将”的赣州卫镇抚卢述，也出身于江西宁都。^② 其他还有王士俊，“南乡金田人……出守泉州，旬日擒黠寇，王崇化直指巡海，交章表其绩”；^③ 左文麟，“官浙江

① 刘昌岳、金时宣等：同治《江西新城县志》卷 10《宦业》，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上》，第 71 册，第 380 页。

② 郑昌龄、梅廷驯等：乾隆《宁都县志》卷 6《人物·武略》，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上》，第 74 册，第 166 页。

③ 姜大定、褚维垣、尹袭澍等：同治《安福县志》卷 10《人物·宦绩》，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上》，第 72 册，第 590 页。

盐运副使，征倭有功，浙江立祠祀之”；^① 松溪主簿邓锡，“海倭围城，奋促官民登陴为死守。倭解去，两台下檄奖”；^② 王谏，先后出任余姚、台州教谕，并“条利弊八事，至于筹策广、福海寇，灼见颠末”^③ 等。可以说，江西“客兵”在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抗倭斗争中，或许并不具有较大规模，但江西籍出身的官员，却是活跃于抗倭前线的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江西虽地处内陆，却紧邻东南滨海省区，素有“闽粤安，则江右宁”之说。因而，江西籍官员对东南沿海形势的发展，尤为关注，甚至不时将抗倭前线的相关信息，通过书信等方式，传回桑梓故里，以为不时之备。《谭襄敏公遗集》中所收谭纶写给江西地方官员、兄弟亲戚的书信中，关于“倭寇情状”的记述就屡见不鲜，成为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就曾写到：

昨报贼至汀州，差去探者，尚未回，即来亦当有以待之，不过与我将士送功。所以报家备之者，乃出于万全之意，沛公徐庶之事，所当知耳。^④

此外，针对江南寇盗横行，城居不便、乡居不安的情形，他在写给父亲的书信中，不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当地士绅之家被寇灭家的惨烈情景，甚至还建议家里“仿北方看家楼制度，建一五间楼堡，以备缓急”。^⑤ 可以说，这些江西籍官员的自身经历、体验，及其对相关讯息的传播与流布，无疑成为江西地区“倭寇”与“日本”知识储备的重要来源。《虔台倭纂》中就收录了不少谭纶关于“通倭”、“操练”，以及傅良桥在总结前人及自身经验基础上所作的关于“传警”、“兵情”、“修堡”等方面的诸多议论。^⑥

四

江西籍官员对东南沿海地区平倭御寇斗争的参与，极大强化了两者内在的精神联系，甚而使一些具有不同历史经验的区域，产生了某种无法言说的潜在关联性。诸如雍正《江西通志》中，就记述了出身于江西南昌府进贤县的泉州知府熊汝达，在“倭逼泉州”时，“悉力捍御，与士卒为伍，夜分披甲不释，相持月余，寇去，泉人德之，为立生祠”的事迹。^⑦ 同治《南昌府志》中也云，其“升泉州知府，捍御倭寇，昼夜不解甲者一月，迁四川按察副使，……其在泉州时，泉人德之，为立生祠”。^⑧ 同治《进贤县志》亦记载他“历升泉州知府，岁己未，倭逼泉州，悉力捍御，日行赤日中，与士卒为伍，夜分被甲不释，相持月余，寇去，泉人德之，为立

① 李人镜、梅体萱等：同治《南城县志》卷8之二《宦业》，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上》，第71册，第268页。

② 刘昌岳、金时宣等：同治《江西新城县志》卷10《宦业》，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上》，第71册，第380页。

③ 范涑等：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19《人物·国朝》，《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册，第420—421页。

④ 谭纶：《谭襄敏公遗集》卷2《报弟》，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嘉庆二十四年序刊本。

⑤ 谭纶：《谭襄敏公遗集》卷2《报父》。

⑥ 参见谭纶：《论通倭》、《论操练》，傅良桥：《论传警》、《论兵情》、《论修堡》，谢杰：《虔台倭纂》，《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册，第232、294、253、292、306页。

⑦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69《人物四·南昌府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5册，第395页。

⑧ 许应鏊等修，曾作舟等纂：同治《南昌府志》卷41《人物·明仕绩下》，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第23册，第15页。

生祠，迁四川按察副使”。^①

对此，修于万历年间的《泉州府志》也有着较为翔实的记叙：

熊汝达，进贤人，嘉靖三十五年以刑部郎中守郡，英敏明达，果敢担负。郡饥亡赖之民鼓众强桀，即下令大发仓廩以平米价。倭夷由海岸突犯安平，延南惠二县，侵逼郡城，多方御却，城中有奸徒谋为贼内应者，以计擒除之。督抚提客兵万余戍郡，粮饷犒给器械，百凡峻促，从容支应，多从节省，有所不便辄持檄入白，必得请乃已。摧抑势豪，无所假借，郡人帖服。祠在城东门外，碑记谓其政尚精严，功多御捍。历官南京右都御史。^②

乾隆年间再修的《泉州府志》中，又参考旧志及福建乡宦林希元等人的文集，对他“下车以十四不要颁行七邑，所禁皆害身家累政治之事……谈利者建盐坵抽分之议……谓宜藏富于民”、“亡赖托铺甲名色，承符七属，凌轹官吏，需索里甲，立草除之”、“上官百需鹭至，以时艰民贫为请，语寓箴规；台察至属官被诬者，力为解救，以飞语被污者白之”、“粮料听民自输，赎金丝毫不染；政暇与诸生讲论经理，亹亹忘倦，多所发明；秋闱校文，得人尤盛”等事迹进行了增补。^③而修于道光年间的《晋江县志》，则在《政绩志》中全文复录了乾隆府志的传记文字。^④

地方志书作为地方意识的一种表达，不同区域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总会有着某些不尽相同的理解。显然，对泉州地区来说，熊汝达的抗倭事迹，实际上就是自身的一种历史经历与体验。而对江西或南昌地区而言，更主要的还是从地方荣誉角度的，一种非经验性的精神解读。因此，从嘉靖到道光乃至同治，地方志书的相关记载，使我们不难看到熊汝达的抗倭事迹，作为一种历史经验在泉州地域的记忆与传承。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地方荣誉，也成为江西尤其是南昌地区彰显其地域性格的一个精神象征。于是，熊汝达及其抗倭事迹，也成为了泉州（福建）与南昌（江西）这两个具有不同历史经验区域的，一个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

不过，通过对两个地区方志内容的比较来看，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泉州地区的方志除却对熊汝达抗倭事迹的颂扬外，对其地方治理的相关业绩也进行了高度评价，而江西地区的地方志书，则几乎忽略了后者，似乎只对其抗倭业绩情有独钟。类似之情景，并非个别。诸如出身于江西吉安府的嘉兴知府刘恂，光绪《嘉兴府志》记载：

嘉靖辛亥守嘉兴，值夏旱，恂率僚属拜祷，月余不懈，卒得澍雨，岁以大稔。癸丑，倭寇侵境，恂率军民昼夜防守。每寇至，洞启四门纳郊关，男女多所全活。时抚按交集视师，添设督察大臣，经略嘉善、平湖、崇德、桐乡诸县，供亿百出，恂殚力承事，不扰于民，有挟权凌之者，恂不为屈。旧额濒海岁贡黄鱼，恂以兵兴，特疏奏请得停免，康介之守，始终不渝。^⑤

除却倭寇侵境，“率民昼夜防守”外，祷雨不懈、安民抗强、停免岁贡等功绩显然也是嘉兴地方民众对刘恂感怀深念的重要原因。但在万历《吉安府志》中，对其出守嘉兴的业绩记载，只剩

① 江璧、胡景辰等：同治《进贤县志》卷17《仕绩》，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上》，第72册，第44页。

② 阳思谦等：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10《官守志下·古今宦绩》，《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4辑，第38号，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869—870页。

③ 怀明布、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卷30《名宦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3册，第37—38页。

④ 周学曾等：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之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98页。

⑤ 许瑶光等：光绪《嘉兴府志·二》卷42《名宦一》，《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3号，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第1038页。

有“倭寇薄郡境，峙饷缮兵，浚葺属邑城池，造船制械，郡赖以安……民为立祠祀之”^① 这一点了。抗倭事迹与地方治理政绩，江西地方志书在选择与编撰上，似乎更看重前者。这种倾向性的选择，与当时江西籍官员相对突出的抗倭业绩，及其对江西地区地方荣誉的塑造与强化，恐怕也是大有关联的。

江西籍官员的抗倭精神与业绩，颇受国家与社会的认可，诸如退休寓居白下的福建布政司理问陶一贯，“闻倭贼入苏松，劫掠淮扬，逼近留都，自赴军门请师督讨，驻师吴江，军威大振，次募兵海上，遇贼于浙江德清县，力战而没。都御史谭纶并两院奏闻，赠奉议大夫，立庙崇祀”。^② 当然，其中最为著名的，还是非谭纶莫属。他不仅在当时即被视为抗倭之名臣，委以重任，声闻朝野，死后亦颇享国家殊荣。据《年谱》记载，“公卒薨，上伤悼，赠太子太保，谥襄敏，赐葬祭四坛，敕葬本邑崇一都麓塘，长子河图世袭锦衣卫百户，次子洛书世袭国子监监正”。^③ 除此之外，为向天下表彰谭纶的丰功伟绩，万历皇帝还先后亲自撰写了“御制祭文”、“御制百日祭文”、“御制下葬祭文”，并下令于北京午门内道旁刻石立碑，“著其勋烈镌于金石，使后世知斯人为国之元勋”。^④ 在《赠谥敕命文》中，万历皇帝对谭纶的宦业功绩总结道：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尽瘁事国人臣，既懋建乎勋庸，崇德报功，朝廷自优隆乎典礼。

义有关乎激劝，情何间于始终尔。故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谭纶，文武通才，甲科英望，为郎而请除倭难，声名已重于留都，擢守而倡义募兵，功伐益征于台郡。夺情再起，所履率皆危途，叙绩屡迁，所投无非剧任。闽南时廛尸祝，不忘奠定之恩，蓟北共称墩台，实资保障之益。中外阅历，建树宏多，迨正本兵，克修邦政。民具瞻仰，方资吉甫之谋猷；天不慙遗，共悼武侯之殒没。追维往勩，宜备恤恩，兹特赠为太子太保，谥襄敏，锡之诰命。

于戏，历仕有功，允协金同之公议；虽亡不朽，永贻垂后之令名。英灵有知，明命克祗。^⑤ 可见，国家对谭纶业绩的认可与表彰，“平倭”无疑是其中一项至为重要的内容。朝野文臣名士亦纷纷为他作传立志，颂扬其“平倭拒虏”之功。诸如时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江西新建人张位、吏部尚书江苏丹阳人姜宝等，都曾为谭纶作传。^⑥

于是，江西籍官员的异地抗倭业绩，在国家崇祀与士林推重的激荡之下，更进一步深化了其作为江西地区的一种地方荣誉的价值与意义。由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当时江西士人，争相“喁喁讲备倭”的社会风尚形成的内涵；也不难理解出身于内陆江西的郭汝霖，何以如斯熟稔倭情，“上平倭十事”，声震朝野，并被选派为册封使出使琉球，^⑦ 以及万历壬辰之役中“南赣兵”的被委以重任了。这不仅是对国难的一种关怀，同时也是对自身地方荣誉的一种张扬与捍卫。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江西地区才会在谢杰抚绥南赣之前，就已具有了较为深厚的关于“倭寇”与“日本”知识的积累，谢杰才得以与江西将士就“倭寇”问题迅速形成互动，也才会有《虔台倭纂》一书的问世。

① 余之祯等：万历《吉安府志》卷20《列传三》，《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1册，第305页。

②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91《人物·南康府二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6册，第107页。

③ 谭纶：《谭襄敏公遗集》卷首《年谱》。

④ 札隆阿等：道光《宜黄县志》二之卷31之一《艺文志·前明宸翰·北京午门内道旁碑文》，《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01号，第391页。

⑤ 札隆阿等：道光《宜黄县志》二之卷31之一《艺文志·前明宸翰·赠谥敕命文》，《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01号，第390—391页。

⑥ 张位：《谭襄敏公传》、姜宝：《谭襄敏公传》，谭纶：《谭襄敏公遗集》卷首。

⑦ 余之祯等：万历《吉安府志》卷20《列传三》，《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1册，第307页。

可以说，紧邻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理位置，使江西不得不较其他内陆地区更为关注沿海“倭患”形势的发展。而大量江西籍官员对抗倭斗争的参与，不仅成为江西地区关于“倭寇”与“日本”知识储备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其塑造、强化自身地方荣誉的重要方式。从这点来看，《虔台倭纂》的编纂，并非仅是谢杰对自身生活的东南沿海地区历史经验的记述，同时也是关乎江西地方荣誉的重事。这种地方荣誉的彰显，使“倭患”地区的历史经验，也成为某些“非倭患”地区予以认可、接受的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事实上，从前面关于《四库全书》各省通志中“倭”与“日本”两词出现频次的统计来看，诸如湖广、山西、广西等其他内陆地区，其“倭寇”记忆的形成路径与程度，或许与江西地区并不全然相同，但这一记忆已然成为其地方历史叙事中的一部分，却是毋庸置疑的。于是，这种从“地方经验”向“共有记忆”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各区域间的内在心理关联，而成为国家与民族共同体建构、维系的一个文化与精神纽带。尤其是丰臣秀吉的入侵朝鲜，及其“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①的野心，促发了明代知识界自嘉靖之后又一次研究日本热潮的兴起，同时也进一步唤醒、深化了人们关于“倭寇”的历史记忆。《虔台倭纂》的形成，只是其中一个微小的侧面而已。不惟如此，对“倭事”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官员、士绅群体，也渗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丰臣秀吉出兵前后，负贩于日本、琉球等地的中国海商陈申、朱均旺等，就不顾险阻冒死将相关情报传递回国内。^②而以“倭寇”为背景的戏曲、传奇、小说，如《斩蛟记》、《鸣凤记》、《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等更成为万历之后民间文学及民间文化生活中一项引人关注的重要内容。^③

附识：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同时亦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林金树老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先生的诸多鼓励与赐教。

〔作者刘晓东，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春 130024〕

（责任编辑：方 兴 责任编审：李红岩）

① 陸軍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店，1978年，第11頁。

② 参见周志明：《明末壬辰战争与中国海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124—128页。

③ 参见遊佐徹：《明清「倭寇小説」考（一）》，《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23号，1995年，第212—222頁；《明清「倭寇小説」考（二）：『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伝』につい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3号，2000年，第66—90頁。

Culture, the San Miao multi-state state was coming into being. The “diversity” in “unity in diversity” should refer to the diverse civilizations of the *bāngguó*, while “unity” refers to the unity of the kingdom civilization.

A New Probe into the Issue Settling the Enmity between the Fan Zhongyan and Lü Yijian Families

Wang Ruilai (54)

The period from the Northern to the Southern Song saw a succession of unresolved arguments over the hostile relations between Fan Zhongyan and Lü Yijian, both of whom had been famous statesmen under Emperor Renzong, and over the banishment of enmity by the two families after both men were dead. Following detailed studies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dust has settled. However, the real intention behind Ouyang Xiu’s writing on this issue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demonstrated. By exploring the process by which this enmity grew and was resolved and the reason Ouyang Xiu hesitated for more than a year before writing the epitaph on Fan Zhongyan’s tomb, and by further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is issue held by the Southern Song school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that of the school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e can see that, in fact, both Fan Chunren’s view that the enmity should be continued and the opposing view put forward by Ouyang Xiu are factual at different cognitive levels. If we leave aside the historical complication of whether the two families did resolve their enmity and scrutinize the issue of the dissolution of enmity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subsequent debates on this issue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nce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identifying and interpreting historical facts, the case may provide us with some methodological pointers fo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a broader sense.

The Formation of the *Qian tai wo zuan* : from Local Experience to Common Memory

Liu Xiaodong (68)

The *Qian tai wo zuan* is a private compilation of memories of the activities of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jing, at a time when Korea was under attack from Toyotomi Hideyoshi. Its main purpose was to guard against and resist the pirates. From an analysis of the compilers of this work and the course process of its compilation it can readily be seen that as early as before the Im Jin War, the Jiangxi region already had quite an in-depth store of local knowledge of “Japan” and “Japanese pirates.” This was partly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on the pirates by a number of officials who were Jiangxi natives and who were serving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where there was rampant piracy in the Jiajing era.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Japanese piracy in the coastal areas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spiritual bond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and also became a major way of shap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fame of these officials’ native place. Thus, what was originally peopl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regions affected by their incursions became a kind of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regions that had not been affected.

Examining the Uprising of the Tianli Sect and the Belief That the Intercalary Eigh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is Unlucky

Zhang Ruilong and Huang Yinong (84)

The belief that the intercalary eigh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is unlucky first emerged in the uprising of the Tianli (Heavenly Principles) Sec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qing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sixteenth year of Jiaqing, the followers of the sect, inspired by the words “Mid-Autumn Festival Eighth Month, Eighth Month Mid-Autumn Festival” in their religious text, chose the intercalary eighth month of the eighteenth year of Jiaqing for their uprising. However, the officially issued almanac had no intercalary eighth month that year, a fact that caused great difficulty for the uprising.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ir determination, the organizers